

分配公正研究的知识谱系

李 石

[摘要] 当代政治哲学中的分配公正研究从公正原则出发,规范分配制度的建构。当代学者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分配原则,包括平均原则、效率原则、差别原则、资格原则、资源平等、能力平等、福利平等、按需分配、应得原则,以及多元分配原则。这十种分配公正原则深刻地塑造了所有权制度、税收制度、薪酬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人才选拔制度等重要的社会分配制度。与此同时,“程序正义”在制度的建构和应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批判的基础上借鉴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讨论如何建构公正的社会分配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学理基础。

[关键词] 分配公正;分配原则;分配制度;程序正义

所谓“社会分配”指的是以适当的原则对人们通过分工合作而生产出来的社会益品 (social goods)^① 和为了共同生活而必须承担的义务进行分配。社会分配所涉及的社会益品不仅包括大量的物质财富,还包括文化产品等精神财富,以及升学、就业、晋升等各种优质的机会。人类社会是一个普遍合作的联合体,不同人群之间通过分工合作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他们之间既有利益的一致,也有矛盾和冲突,需要找到适当的分配原则,并建构符合原则的制度和政策,对不同的社会益品进行分配。“分配公正研究”的第一步就是找到这种“恰当”的分配原则——公正原则。这是一种在人类合作体系中划分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的原则。第二步就是要探索在公正原则的基础上如何建构出公正的分配制度。第三步则是在基本的公正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出具体的分配方案并予以实行。在这三个步骤的研究和实践中,程序正义在三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一,人们对公正原则的理论推导必须符合程序正义,从确定无疑的理论原点依据逻辑推理得出结论;第二,分配原则所确立的分配过程必须符合程序正义;第三,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的制定过程必须具有合法性,要符合既定的立法程序,在全体人民的监督和支持下进行。

分配公正研究是一个多学科、多维度、多面向、综合性极强的研究领域。首先,分配公正研究包括社会分配的原则、制度、政策,以及程序正义等诸多内容,是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具体说来,分配公正原则的推导是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分配制度的建构是政治学的研究内容,而具体分配方案的制定和评价则与财政、税收、社会保障等经济领域的研究关系密切。其次,分配公正研究的成果有益于对国家的基本制度做出规定,这些制度包括所有权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税收制度、薪酬

作者: 李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共同富裕研究院研究员、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lishi@ruc.edu.cn。

^① 对于 good、goods 和 goodness,中国学界有多种翻译,包括善、益品、产品、好处、利益等。对于“social goods”本文统一使用“社会益品”这一翻译,指人们通过分工合作而创造出的所有社会财富。有关讨论可参见刘莘:《关于“good”的翻译的哲学解释》,载威廉·金理卡:《当代政治哲学》,附录,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制度、福利制度、人才选拔制度，等等。最后，分配公正研究涉及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公共资源分配，这些公共资源包括：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文化资源、社会保障资源，等等，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分配公正研究是建构公正的社会分配制度的基础，而公正的分配制度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本文将首先梳理当代分配公正理论中的十种分配原则，在此基础上讨论这些分配原则对分配制度做出了什么规定，最后分析“程序正义”在分配制度的建构和应用中所发挥的作用，并指出分配公正研究对于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目标的理论意义。

一、分配公正的原则

分配公正是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重中之重。1971年，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反响，学者们纷纷围绕罗尔斯提出的与分配公正相关的各种问题进行讨论。这些问题包括正义的环境、正义的主题、正义的原则、正义原则的推导，等等。由此，分配公正研究成为政治哲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罗尔斯之后，许多著名学者都对分配公正做出了重要论述。在这些讨论中，学者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分配公正原则。这里介绍和讨论其中重要的十种原则，分别是：平均原则、效率原则、差别原则、资格原则、资源平等、能力平等、福利平等、按需分配、应得原则，以及多元分配原则。这十种原则与分配公正的制度建构息息相关，对社会益品的分配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平均原则指的是一种严格的平均主义（strict egalitarianism）分配原则。这一原则主张将一切社会益品和负担进行平均分配。支持这一观点的道德原则是“人人平等”。在严格的平均主义者看来，只有当所有人拥有同样的收入、财产和服务、并对社会付出了同样的辛苦时，才真正实现了“人人平等”的道德要求。平均原则通常会受到两方面的批评：一是“拉平反驳”，二是绝对平均的分配无法延续。“拉平反驳”是英国政治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对平均原则的批评。帕菲特认为，平均原则为了平等而平等，将“平等”本身作为分配的目的。这种分配方案会遭遇“拉平反驳”，亦即，当无法提高获利较少者的期望时，平均原则会主张拉低获利较多者的期望。为实现平均分配而拉低较高者的获利，势必造成资源的浪费和效率的降低。效率低下是平均原则受到的最重要的批评。另一方面，当我们将时间维度引入平均原则时就会发现：即使绝对平均的分配是可以实现的，也无法保证这种分配模式能够持续存在。因为，人们总有相互交换的倾向，而人们的自愿交换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自由市场必然会造成贫富分化。为了避免上述两个问题，一些平等主义者，例如美国学者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 Ackerman）和安妮·阿斯多特（Anne Alstott）^①主张，人们应该在某一初始时刻（initial point）拥有同样多的社会益品和负担，而之后则任由其自由发展。这样的理论被称为“起始门原则”（starting-gate principle）。但是，这一版本的平等主义分配，在社会实践中却会导致非常严重的不平等。因此，更多的严格平等主义者倾向于主张保障人们收入的平等化。^②但收入平等化的分配策略也会因每个人“理财能力”的不同，而最终无法实现平均原则的分配目标。

第二，功利主义是在西方流传甚广的一种政治道德学说。在社会分配的问题上，功利主义的主旨是要实现一种能够使得社会财富总量最大化的分配，或者是效率最大化（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分配。可以说，功利主义的分配方案遵循效率至上的分配原则。然而，功利主义给出的分配方案却受到了当代学者的诸多批评。例如，罗尔斯、美国法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等著

^① Bruce A. Ackerman, and Anne Alstott. *The Stakeholder Societ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② Kai Nielsen. "Radical Egalitarian Justice: Justice as Equality". *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1979 (5): 209 - 226.

名学者都对功利主义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包括: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推进有可能侵犯人们的权利,要求每个人都推进社会整体利益是过高的道德要求,为了推进社会整体利益有可能将“不正当偏好”计算在内,等等。

第三,为了兼顾平等和效率这两个重要价值,罗尔斯提出了基于差别原则的分配公正理论。其理论初衷是:如果某种分配与严格的平均分配相比,将有利于所有人,那么这种分配显然是优于严格的平均分配的,是一种更可取的分配方案。所以,即使基于“人人平等”的道德原则,我们也应抛弃严格平等主义的分配,而选择一种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安排适合于社会中每个人之利益的分配。罗尔斯构建了“差别原则”来阐述这一分配构想。差别原则的作用在于平衡效率和平等两种价值,给人们之间的不平等划出界线。对于人们的社会合作来说,某一限度内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可能是有益的,可以增进所有社会阶层尤其是社会中的弱势阶层的最终获得。但是,当这种不平等超出了一定的限度,人们之间的关系就改变了,不再是互惠互利,而是剥削和欺压。因此,差别原则的作用就是给出社会和经济之不平等的限度,以最小受惠者期望的最大值为限。当不平等使得最小受惠者的期望开始下降的时候,这样的不平等就是不公正的,就应该受到限制。当然,差别原则并不能单独确定一种社会分配结构,还需要对权利、机会、义务和负担做进一步的规定。由此,罗尔斯还构建了“平等的自由”原则和“公平机会的平等原则”。罗尔斯认为,在进行制度安排时,我们必须首先保证所有人的权利平等,接着保证机会平等,最后再满足差别原则,使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安排有利于社会中的最小受惠者。

第四,在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自由至上主义者提出了分配公正的资格原则。资格原则是赋予“所有权”以优先地位的分配学说。这一派别的代表人物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伯特·诺奇克(Robert Nozick),他在继承古典自由主义最小国家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持有正义”理论。^①这一理论的基础是“自我所有权”理论,即认为人们对于自己的劳动成果拥有绝对的、不容侵犯的权利。人们在自由市场中凭借通过劳动而获得的财产进行交换,这是一种程序正义,不应该受到任何干涉。由此,诺奇克反对通过再分配对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进行援助,认为这样的分配政策都会侵犯人们的“自我所有权”。诺奇克被称为右派自由至上主义者。

另一派自由至上主义者,虽然也坚持不受侵犯的私有产权,却提出了许多“左倾”的政治主张,被称为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主要代表有加拿大籍旅英哲学家希勒尔·斯坦纳(Hillel Steiner)、比利时政治哲学家菲利普·凡·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美国政治哲学家彼得·瓦伦丁(Peter Vallentyne)、美籍旅英政治哲学家迈克尔·大冢(Michael Otsuka),以及英籍旅意哲学家伊恩·卡特(Ian Carter)。他们认为,劳动虽然属于每个人自己所有,但是土地和自然资源并非人们的劳动成果,所有人应共同享有世界上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所以,当某些人私自占有某一块土地以及土地上所富含的自然资源时,就应该上缴“土地税”或“资源税”,以补偿其他人因其占有而遭受的损失。由此,基于“所有权”理论的资格原则呈现出“左”“右”两种不同的路径,右派自由至上主义者反对任何税收,而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则支持财产税和遗产税。

第五,罗纳德·德沃金在批评和继承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源平等理论。在政治理论谱系中,德沃金与罗尔斯同属自由主义的中左派。但是,德沃金对罗尔斯的分配公正理论也有很深刻的批评。他认为罗尔斯在考虑社会分配问题时,没有体现出个人的选择和努力对于分配结果所发挥的作用。德沃金提出了“钝于禀赋,敏于志向”的分配目标,想要建立一种将人们所拥有的资源平等化而仅依据每个人的选择和努力进行分配的公正理论。德沃金将人的自然禀赋看作是“人格

^① 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Basic Books, 1974.

资源”，而人们所处的社会境况则属于“非人格资源”。德沃金认为，当一个人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他的自然禀赋和社会境况都是既定的，这些因素与他自身的努力和选择无关。因此，社会分配制度应该排除掉这些不平等的因素，而仅仅体现人们自己的选择和努力。对于那些在自然禀赋或社会境况方面处于劣势的社会成员，例如天生愚钝者或出身贫寒者，应通过税收等再分配机制予以补偿。

德沃金的分配理论在英美学术界颇具影响，大批学者开始讨论和发展“钝于禀赋，敏于志向”的分配理论。这些学者被美国政治哲学家伊丽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称为“运气均等主义者”，其中包括美国政治哲学家理查德·阿内逊（Richard Arneson）、英国政治哲学家 G. A. 柯亨（G. A. Cohen）、美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罗默（John E. Roemer）以及比利时政治哲学家菲利普·凡·帕里斯，等等。^①

第六，当代分配学说中的能力路径是印度籍旅美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美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tha Nussbaum）和伊丽莎白·安德森共同推进的分配学说。他们认为，在考虑资源的分配问题时，不应从资源、福利、基本善等这些物质变量入手，而应关注人们的“可行能力”，关注人们是否能平等地实现健康、识字、参与公共事务等各项基本功能。而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也应以是否为人们“可行能力”的培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和环境条件为依据。在分配目标上，阿马蒂亚·森试图实现人们在“可行能力”上的平等，而努斯鲍姆和安德森则将人们实现某一最低限度的“可行能力”之物质保障作为社会分配的目标。

第七，福利平等原则是功利主义思想在当代平等主义思潮下的一种转变。这一分配原则要求分配给每个社会成员同等的“福利”。所谓“福利”，指的是理性偏好的满足。福利平等原则受到德沃金的深刻批评，他认为，福利平等原则可能助长人们奢侈的爱好。因为，为了达到同样的偏好满足，社会必须分配给那些贪图享乐的社会成员更多的公共资源，这是不公平的。为了回应德沃金的批评，阿内逊将福利平等原则修正为“福利机会平等原则”，将个人责任的因素纳入社会分配的考虑之中。^②

第八，“按需分配”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构想的人类进入共产主义之后全面应用的分配原则。在人类社会的现阶段，人们应用“按需分配”原则对必需品进行分配，例如：基本的医疗服务、干净的饮用水和食物、基础教育，等等。美国政治哲学家哈里·弗兰克（Harry Frank）在“按需分配”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出“充足主义”（sufficientarianism）的分配理论，主张通过社会再分配机制，尽量多地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然而，当社会资源不足以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要时，就出现了“优先”满足谁的需要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帕菲特提出了分配公正的优先原则：将资源优先分配给那些最穷困、基本需要之满足最为迫切的社会成员。^③除了帕菲特之外，支持优先主义的当代学者还有迈克尔·大冢、瑞典伦理学家伍勒德克·拉比诺维奇（Wlodek Rabinowicz），等等。

第九，应得原则要求根据某种应得之基础来分配各种社会产品和资源。在当代讨论中，西方学者提出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应得基础：（1）英国政治哲学家大卫·米勒（David Miller）以及美国政治哲学家乔纳森·赖利（Jonathan Riley）主张将“贡献”作为应得的基础，根据人们对于社会生产所贡献的价值来进行分配。（2）澳大利亚法学家沃伊切赫·萨杜尔斯基（Wojciech Sadurski）提出将努力（effort）作为应得的基础，根据人们在社会合作中所付出的努力来分配。（3）美国政

① Elizabeth Anderson. “What Is the Point of Equality?”. *Ethics*, 1999, 109: 287 - 337.

② Richard Arneson. “Liberalism, Distributive Subjectivism, and Equal Opportunity for Welfare”.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990, 19: 158 - 194.

③ D. Parfit. “Equality or Priority?”. The Lindley Lecture.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1995.

治哲学家詹姆斯·迪克（James Dick）和澳大利亚政治哲学家朱利安·拉蒙特（Julian Lamont）主张社会分配应补偿人们在社会合作中的花费，将花费作为应得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按劳分配”也是应得原则的一种，是主张将“劳动”作为应得之基础的应得原则，要求依据人们的“劳动量”进行分配。应得原则受到的最大的批评来自罗尔斯和德沃金。他们认为，应得原则使得人们所获得的利益受到许多自己无法控制的社会和自然因素的影响，在社会分配中混入了不公平的因素。罗尔斯和德沃金主张，人们与生俱来的自然和社会禀赋都是不应得的。这被称为“反应得”（less desert）理论。

第十，上述各种分配公正理论虽然提出了不同的分配方案，但都只强调社会分配中的单一原则，被称为一元分配正义。与一元分配正义相对的是“多元分配正义”。这种理论主张对于不同的社会益品应该应用不同的分配原则进行分配。多元分配正义学说最有影响的阐发者是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他认为，公正原则本身在形式上就是多元的，人们应该基于不同的理由、依据不同的程序、通过不同的机构来分配不同的社会益品。沃尔泽将自己的正义理想称为“复合平等”，这种平等追求的不是单一领域分配的平均，而是在各领域各种分配原则的独立作用之下得到的各种分配结果的集合。同样支持多元分配理论的还有米勒。米勒认为，分配原则之所以应该是多元而不是一元，还因为在不同的分配“场域”中“人类关系的模式”不同。米勒将人类关系模式分为三种：“团结的社群成员”“工具性的联合体”以及“平等的公民”，并且认为，这三种关系模式决定了对必需品依据“按需分配”原则分配，对优质的机会依据“应得原则”进行分配，对公民权利依据“平等原则”进行分配。

二、社会分配的制度

上述十种分配公正原则对于社会分配制度的建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国家制度层面，除了法治、民主等基本政治制度外，有许多根本性的制度是与社会分配紧密相关的，这些制度包括所有权制度、薪酬制度、税收制度、福利制度、人才选拔制度，等等。这些社会制度的建构和运行深刻地塑造了人们的公共生活，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取用公共资源必须遵守的规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强调，“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①。在罗尔斯看来，人们取用和分享公共资源的规则必须是公正的，是有益于各方的，而不是仅仅偏重任何一群人。下面，我们探讨不同的公正原则与制度建构之间的关系。

（一）所有权制度

一个国家的所有权制度是分配制度的根本。因为，分清“你的”“我的”，厘清财产和收入的权利归属，这是进行社会分配的第一步。上述讨论的第四种分配公正学说——资格理论对所有权制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and 颇有成效的建构。资格理论的出发点是“自我所有权”，亦即，每个人对自己的“人身”（body）的所有权。从每个人对自己的所有权出发，资格理论家们推导出人们对自己劳动的所有权，再进而推导出人们对自己的劳动产品的所有权。资格理论为所有权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左派、右派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确定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右派自由至上主义者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没有进行明确的论证，只是假定人们对自己的劳动拥有所有权，并由此推出人们对自己的劳动产品拥有所有权。在这一推导中，英国17世纪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诺奇克等右派自由至上主义者忽视了人们对自然资源是否拥有所有权这一问题。例如，洛克在

^①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4.

《政府论（下篇）》中论述到，在劳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自然和土地只提供本身几乎没有价值的资料”^①。显然，劳动产品中不仅包含人的劳动，还不可避免地包含自然资源，而自然资源的归属问题将决定人们是否有权获得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正是敏锐地察觉到右派自由至上主义者对自然资源之所有权问题的含混其词，而对右派的分配学说提出了批评。在斯坦纳等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看来，所有人对自然资源拥有平等的权利，应该取用平等的份额。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一些人取用了过多的自然资源（例如一些人拥有大量的房产、土地、矿产，等等），这是不公平的，这样的状况应该通过分配制度的调整予以纠正。调整所有权结构的最有效的制度手段就是税收。假设，政府征收很高的累进制房产税，那么，许多人就会减持自己手里的房产，这就将减轻人们对自然资源占有的不平等状况。由此看来，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通过对所有权问题的讨论，为房产税、土地税、资源税等税收制度提供了论证。

值得注意的是，分配公正的资格理论不仅规定了有形物的所有权，还关注“无形物”的所有权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们对智力成果的所有权——知识产权。站在资格理论的立场，智力劳动成果中包含的是人们的智力劳动，几乎没有自然资源，因此，智力成果应该完全归劳动者所有。这样的推理为知识产权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智力劳动成果与其他类型的产品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这就是：人们对智力劳动成果的取用不具有排他性。尤其是在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对于同一个智力劳动成果，人们可以毫无妨碍地同时取用。在某些情况下，相较于知识产权保护，解除智力劳动成果的所有权能够更大程度地推进公共福利。例如，一种救命的新药被发明出来，公开这一新药的研制方法将大大推进人类整体的福利。另外，智识产品的生产虽然通常不用取用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但是必须借助已有的人类知识，而这些知识是属于全人类共有的“智识公有物”，对于智识公有物的取用和再创造是否应遵循相应的规则？这些复杂的问题给知识产权制度带来诸多争议。而这也是社会分配制度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在激励创新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推进公共福利。^②

（二）税收制度

在建构了明确的所有权制度的基础上，公正的社会分配还要求通过税收制度来推进公共福利、调节贫富差距。

第一，在税收的问题上，资格理论中的左派学者给出了非常具体的论证。他们从对自然资源所有权的讨论出发，主张对那些过多取用自然资源的社会成员收取累进制的资源税，占用得越多，收的税也越高。这些税收通常以财产税和遗产税的形式出现。一些学者甚至主张，对超出一定限度的遗产收取没收性的遗产税，即100%的遗产税。^③对于如何使用通过税收所筹集的资金，一些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主张，以税收筹集的款项为全体公民发放一种无差别的“基本收入”，以体现公民们对自然资源的平等权利，这被称为“基本收入制度”。^④

第二，德沃金提出的资源平等理论也明确地论证了累进制的财产税和个人所得税。在德沃金看来，人们在自然资质和社会境况方面的不平等都是不应得的，应该通过社会制度的调整补足那些自然资质或社会境况较差的社会成员。具体的调节措施就是税收：为了补足一些社会成员在社会境况方面的劣势，应该收取累进制的财产税；为了补足一些社会成员在自然资质方面的弱势，应该收取

① 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28页，商务印书馆，1964。

② 关于知识产权制度的讨论，参见拙作《知识产权制度的哲学反思》，载《哲学研究》，2019（8）；《基金激励机制：知识产权制度的替代方案》，载《读书》，2020（1）。

③ 参见笔者与斯坦纳教授的访谈《源于个人选择的正义》，载《国外理论动态》，2018（12）。

④ Philippe Van Parijs. *Real Freedom for All, What (if anything) Can Justify Capitalism*. Clarendon Press, 1995.

累进制的个人所得税。这些税收都应该是累进制的,在自然资质和社会境况方面的优势越大,“不应得”的优势越多,缴纳的税款就应该越高。

第三,在如何平衡效率和平等的问题上,罗尔斯提出的差别原则给出了精确的回答。反对重税的理论家通常认为,税收会打击人们劳动和投资的积极性,会降低整个社会合作的效率,使社会生产的财富总量降低。差别原则的核心要义是:社会的再分配程度,应该以最小受惠者利益的最大化为限。也就是说,如果再分配程度太高,会削弱优势群体劳动和投资的积极性,使得社会合作所产生的社会财富总量降低,并最终危及弱势群体的利益。相反,如果再分配程度太低,或者根本没有再分配,那么最小受惠者由于议价能力太低,在社会合作中的所得会很少。因此,到底应该如何设计以税收为基础的再分配制度?什么限度的再分配最恰当?这就是罗尔斯提出的差别原则要回答的问题:以最小受惠者的期望为指标,税收制度的设计应该使得最小受惠者的期望最大化。在这一问题上,功利主义的思路是不同的,功利主义的主旨是要把“社会益品”这张饼做到最大。因此,功利主义者通常会主张减税,最大限度地支持自愿交换,提高社会合作的效率,以生产出最大量的社会财富(用经济学的指标来说就是GDP最大化)。当然,在当代平等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功利主义学说也转变了其分配目标,延伸出福利平等的思想。

第四,福利平等理论的分配目标不再是社会福利总和的最大化,而是所有社会成员达到同等的福利水平。这一分配公正学说支持税收制度发挥其再分配的功能,以补足那些福利水平较低的社会成员,缩小贫富差距,让所有社会成员处于同一福利水平上。在这一点上,阿马蒂亚·森所阐发的能力平等与福利平等是类似的,区别仅在于他关注的是“可行能力”的平等,而不是福利的平等。然而,“可行能力”的平等同样需要通过税收等再分配制度筹集资金为人们培养同等水平的“可行能力”提供物质条件。努斯鲍姆和安德森与阿马蒂亚·森同属能力主义的阵营,但他们所阐发的能力主义分配学说则主张确定一个可行能力的“门槛值”,而通过税收筹集到的资金仅用于保证为这一门槛值的实现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而不是旨在达到“可行能力”的平等。除此而外,分配公正学说中的按需分配原则也同样支持以税收制度筹集资金,为人们提供在社会中维持一种“体面生活”并进行自我发展所必需的物质条件。

(三) 社会保障体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国家只有在税收制度的基础上,才可能建构牢固的社会保障体系。税收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资金来源。当然,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来源并不一定全都是税收,有可能是通过保险机制来筹集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但是,除非保险是一种全民的强制性的保险,这种社会保障体制才可能为每一个公民提供生活保障。相反,如果保险不是强制性的保险,而是自愿购买的商业保险,例如医疗、养老等商业保险,那么这样的保险只可能保护那些有能力购买保险的人。对于真正经不起生活的打击、真正需要保护的穷人来说,他们是没有闲钱购买保险的。而如果一种保险是强制性的,例如,许多国家的医疗保险,“交强险”,那它就带有了税收的性质。因为,“强制性”正是税收的一个根本特征。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就将“政府发起的社会保障项目的缴费”称为继所得税、资本税和消费税之后的第四种税收。^①

分配公正学说中的“按需分配”原则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基础。支持按需分配原则的学者认为,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有三方面的基本需要是根本性的,必须通过国家的分配制度予以满足,这三方面的需要是:生物学需要、体面生活的需要以及自我发展的需要。“生物学需要”是人

^①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509页,中信出版社,2014。

作为动物而生存下来的基本需要，包括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物质条件。“体面生活的需要”是人之为人、能够有尊严地生活、能够体面地参与公共生活的基本需要，包括体面的着装、体面的食物和居所、良好的公民教育，等等。“自我发展的需要”指的是每个人发展自身能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包括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失业保险，等等。正是在“按需分配”原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通过税收等再分配制度筹集资金建构保护全民的安全网。这一安全网覆盖教育、医疗、养老、失业等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举集体之力保障所有社会成员的生物学需要、体面生活需要以及自我发展的需要。一个社会通过税收等再分配制度筹集到的公共资金越多，就越能建构牢固的、水平较高的安全网；相反，如果再分配力度不够，筹集不到足够的公共资金，那么就无力建构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就无法通过分配制度的安排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在这样的社会中，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构中还存在着优先满足哪一类人的基本需求的问题。是将有限的公共资源平均分配给所有社会成员，还是优先满足距离“门槛值”（“门槛值”指的是划定的基本需要之满足的最低限度）较近的社会成员，还是优先满足那些距离“门槛值”最远的社会成员？在这个问题上，平等主义、优先主义和充足主义的观点存在分歧。平等主义的观点是将有限的资源平均分配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但这样的做法有时候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例如，如果有限的药品只够救助 8 个病人，那么将这些药品平均分配给 10 个病人则可能一个病人也救助不了，白白浪费了药品资源。优先主义主张优先救助距离“门槛值”最远的社会成员，这种资源分配方案考虑了人们之需要的“紧迫性”，但得到救助的人数最少。相反，充足主义主张优先救助距离“门槛值”最近的社会成员，这种资源分配方案没有考虑人们之需要的“紧迫性”，但是能使最多的人得到救助。^① 总之，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设计取决于在特定文化和历史背景下，通过人们的商议而达成一致的某种资源分配方案。

（四）薪酬制度

薪酬制度的设计也是与社会分配息息相关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有两种分配公正学说做出了直接的论述：一种是主张放任自由市场的资格理论，另一种是主张“应得原则”的分配学说。在资格理论看来，一份工作得到多少钱的报酬，这应该由自由市场中的供需关系决定。因为“工资”不过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而价格应该由市场来决定。然而，在主张对自由市场进行监管和调控的理论家看来，“市场价格”并非是“公平价格”（just price）。由于普通劳动者的议价能力通常较低，在议价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所以在自由市场中拥有更多资源的人获利会更多。在这些理论家看来，如果一份全职的工作，其工资不足以维持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体面生活，那么如此低的工资就是不道德的，就是剥削^②，应该通过分配制度的调整予以纠正。“最低工资制度”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最重要的制度设计之一，罗尔斯的公平合作理论、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理论以及安德森的能力主义学说都对“最低工资制度”做出了哲学论证。与最低工资制度类似的还有对于“最长工作时间”的规定。“最低支持价格”制度的理论基础也是类似的：相比于收购农产品的大公司，生产农产品的农民在议价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市场价格往往偏向于大量收购农产品的企业主，因此为了纠正这种不公平的议价过程，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国家制定出农产品的“最低支持价格”。

“应得原则”也是薪酬制度设计中常用的分配公正原则。这一原则通常依据人们所做的贡献、付出的劳动或是花费的成本来确定一份工作的报酬。“按劳分配”也是一种应得原则，其应得的基

^① R. Crisp. "Equality, Priority and Compassion". *Ethics*, 2003, 113: 745-763.

^② R. Sample. *Exploitation: What It Is and Why It's Wrong*.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3.

础是“劳动量”，依据人们的劳动量进行分配。在应用“按劳分配”原则时应当注意的是，人们在不同行业的劳动形式是不同的，而不同形式的劳动之间通常很难进行比较。例如，一个程序员的劳动和一个快递员的劳动就很难进行比较。而哪种劳动应得什么水平的工资，通常与该种劳动所需的知识储备、辛苦程度、具有相关技能的应聘者数量等因素相关。另一方面，在人们的收入中，除了劳动收入之外，还有一部分是投资收入。而且，对于越富有的人来说，投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例越大。投资收入对于整个社会的分配格局的影响绝不能被忽视，应纳入社会分配的整体规划中。然而，对于投资收入，是无法应用“按劳分配”原则予以分析的，只能应用前述资格理论主张的自由市场原则以及罗尔斯阐述的公平合作理论进行分析。简单来说，拥有巨大资本的社会成员在社会合作的议价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他们能够凭借手中的资本获得更多的财富（例如，拥有1亿资产的投资者，每年至少能从其资产中获利300万元，而这些都并非劳动收入），而这种优势地位与他们个人努力的关系不大，根据罗尔斯和德沃金的观点，是不应得的。因此，应该通过税收等再分配手段削弱这种不公平的优势地位，对资本征税等都是应有的制度措施。^①

（五）人才选拔制度

社会分配不仅包括对物质性社会益品的分配，还包括对各种优质机会的分配。这些机会广泛地存在于教育、工作以及各种比赛和评比当中，决定着每个人在社会竞争中可能达到的高度。因此，一个国家的人才选拔制度、工作分配制度以及各部门、各单位的晋升制度都是重要的社会分配制度。对各种机会的分配都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机会平等”。在当代政治哲学讨论中，机会平等呈现出三种含义：前途向才能开放，公平机会的平等，以及“钝于禀赋，敏于志向”。“前途向才能开放”的机会平等指的是机会应该给予具有相应才能的人。这一理解与始自亚里士多德的“应得原则”是一致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社会资源应该依据人们的“美德”（virtue）进行分配。^②在古希腊的语境中，所谓“美德”指的是人们在某一方面的“卓越”，具有相应的才能。因此，“前途向才能开放”与“应得原则”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符合人们道德直觉的分配原则。当然，“应得原则”的应用并不局限于对机会的分配，还广泛地存在于对物质性资源的分配，尤其是上述提到的关于工资制度的设计。“公平机会的平等”是罗尔斯提出的机会平等原则，指的是对机会的分配应保证具有同等自然资质、同样志向的社会成员有同等的教育和成功前景。“钝于禀赋，敏于志向”是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理论的分配原则。在机会平等的问题上，德沃金主张自然和社会的不平等是不应得的，公平的社会竞争应该将机会给予那些做出较优选择并且加倍努力的社会成员。

我们可以这样来比较这三种机会平等：一个人在社会竞争中最终所处的位置受三个因素的影响——自然资质、社会境况、个人的选择和努力。那么，“前途向才能开放”的机会平等对这三个因素都是敏感的。也就是说，当一个具有相应才能的人获得相应的机会时，他有可能得益于自己的天赋，或者是较优的社会境况，也可能是由于自己的志向和努力。在罗尔斯和德沃金看来，这种机会平等将不公平的因素（自然的或社会的）混入竞争当中，不足以实现实质性的机会平等。因此，罗尔斯的“公平机会的平等”原则主张排除掉社会境况的因素，使得天赋相当的人只要付出同样的努力，就能达到同等的竞争结果，而无论他出生于什么样的家庭，也无论他生活在什么地方（农村还是城市）。而德沃金的机会平等观念则更进一步，要求社会竞争的规则不仅要排除掉社会因素，还要排除掉自然因素，使得人们的竞争结果仅仅与个人因素相关。这三种不同的机会平等理论论证

①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构想了一种“全球资本税”，试图通过向“资本”征税以调节人们的收入分配。参见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十五章，中信出版社，2014。

②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edited by Roger Crisp. Cambridge Press, 2000, p. 87.

了不同的人才选拔制度。对于“前途向才能开放”的机会平等观来说，要求人才选拔有统一的评判标准（例如高考），这一标准只与人们的“才能”相关，而与其他因素（例如性别、出身、宗教、种族等）无关。谁在这一标准中得分最高，谁就将获得最优质的机会。“公平机会的平等原则”要求在统一的评判标准的基础上，对社会境况较差的社会成员予以优待政策，例如：在升学考试中增加贫困地区的录取名额，加大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增强师资力量，等等。德沃金提出的“钝于禀赋，敏于志向”的机会平等观则强调对自然资质较差的社会成员的补助，这种补助包括为他们提供免费的特殊教育，等等。

分配公正的各种原则深刻地塑造了所有权制度、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薪酬制度、人才选拔制度等各种社会分配制度。在不同的分配领域，不同的分配原则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例如，对于生活必需品的分配，“按需分配”原则是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对于各种机会的分配，“应得原则”“公平机会的平等原则”等分配原则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对于自由市场中流通的物质产品的分配，则通常是由资格原则决定的。如此看来，似乎正如沃尔泽所说，每一种分配原则都有其自身的“场域”，依据某一“益品”的价值和意义而对其进行分配。这正是沃尔泽提出“多元分配正义”学说的出发点。在沃尔泽提出多元分配正义学说之后，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一元分配正义与多元分配正义之间的争论。美国学者艾米·古特曼（Amy Gutmann）^①、理查德·阿内逊^②等学者都对多元分配公正提出了质疑。值得注意的是，罗尔斯在发展自己的正义学说时，也讨论过“一元”与“多元”的问题。^③罗尔斯将“按需分配”“按劳分配”等分配原则称为常识性准则，并强调常识性准则是从属性的而不是根本性的分配原则。在罗尔斯看来，他的正义两原则与常识性准则之间并不是矛盾的，只是两类原则处于不同的层次而已。罗尔斯的正义两原则是对社会基本结构的规定，是更高层次的公正原则，而沃尔泽所说的按需分配、按贡献分配、按努力分配等分配原则属于罗尔斯所说的“常识性分配正义准则”。最高公正原则是一元的，而具体领域的分配原则却可能是多元的，这两种学说并不矛盾。借鉴罗尔斯的观点，在社会分配制度的建构中，罗尔斯提出的正义两原则是对包含所有社会分配制度在内的社会基本结构的规定，而“按需分配”“应得原则”“资格原则”等其他分配原则是对所有权制度、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薪酬制度、人才选拔制度等具体分配制度的规定。

三、分配公正的程序正义之维

始自罗尔斯的当代分配公正研究区别于以往公正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程序正义”的强调。程序正义是一种与结果正义相对的概念。支持程序正义的学者主张，任何做出集体决策的程序（不论这一决策事关个人的司法审判还是对于公共益品的分配）都应该符合一定的道德原则，例如：平等、尊重、公开、避嫌，等等，而且对于此程序是否是正当的判断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对程序的结果是否正当的判断。如果一种程序并不符合相应的道德标准，那么这样的程序就可能是不公正的程序，不能称为程序正义。举例说明，如果一个法官对某案件进行审理，而其亲属与该案件有关，那这样的审判程序就有不公正的嫌疑，不具备程序正义的特征。

在分配公正研究中，程序正义在三个层面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公正原则的推导过程必须符合程序正义；二是公正原则本身构成对社会益品进行分配的程序正义；三是分配制度的建构过程必

^① Amy Gutmann. "Justice Across the Spheres". *Pluralism, Justice, and Equality*. edited by David Miller, and Michael Walz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99 - 119.

^② Richard Arneson. "Against Complex Equality". *Public Affairs Quarterly*, 1990 (4): 107.

^③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67 - 273.

须符合程序正义。

第一,当代学者对于公正原则的推导都非常强调推理过程的程序正义。

这一哲学风格始于罗尔斯。罗尔斯采用社会契约论的论证框架推导正义的两原则。他在传统社会契约论者所论述的“自然状态”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构建了一个更为公平的签约状态——原初状态。与传统的“自然状态”相比,原初状态多了“无知之幕”这一理论设计:商议和制定分配原则的人们在“无知之幕”后面,不知道自己的性别、财富状况、所属阶层、善观念、心理偏好等诸多信息,这使得他们无法将原则剪裁得适合于自己的利益。在罗尔斯的构想中,原初状态是一个“纯粹程序正义”^①,亦即,从“原初状态”中推导出来的原则都是公正的,这一程序本身保证了公正原则之内容的正当,而无须依据独立于程序之外的原则判断推导出的原则是否正义。这也正是罗尔斯将自己的公正学说称为“作为公平的正义”的根本原因,其含义是,从“公平”的原初状态中推导出来的原则是“正义”的。

德沃金的资源平等原则的推导也严格地遵守了程序正义,这一程序就是“荒岛实验”。德沃金构想了一个所有人同时到达一个拥有各种资源的荒岛上。由于这些资源并非其中任何人的劳动成果,所有人对所有资源拥有平等的权利,这是一个推导出分配公正原则的理想的理论起点。在“荒岛实验”中,为了让人们能够平等地分享岛上所有的自然资源,德沃金构想了“等货币量的拍卖”:先分给每个人等量的“货币”(比如一百个贝壳),然后,人们用自己手里的货币参加一场“拍卖”。每一种物品都将以能够清空该物品的最高价格被拍卖。拍卖的最终结果将是:每个人都以等量的货币购买到了自己想要的一组物品,没有人会情愿要别人的一组物品而非自己的一组。也就是说,没有人会“妒忌”其他人的所得。德沃金将这称为“妒忌测试”(envy test),这一测试标志着社会分配是否达到资源平等的目标。然而“拍卖”只解决了“非人格资源”的分配问题,人们不再妒忌别人手里的东西,但有可能妒忌别人的“天赋”。为了解决“人格资源”的不平等问题,德沃金在“拍卖”的基础上增加了“虚拟保险”这一程序,亦即,人们在参加“拍卖”之前,先拿出一部分钱购买针对自然资质较差的保险。通过这一保险,那些自然资质较差的人将得到赔付,而自然资质较好的人则将负担赔付的费用。如此一来,人们不仅在“非人格资源”上实现了平等,也对“人格资源”较差的社会成员给予了相应的补偿。德沃金公正学说的论证框架也是契约论,从一个理论假设的公平起点(荒岛实验)出发,一步步推导出应然的分配公正原则,这正是程序正义的要义。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等货币量的拍卖”和“虚拟保险”都是不存在的,这些思想实验的意义在于解释在一种假想的公平条件下人们会采用什么样的分配原则。在现实世界中,“拍卖”和“保险”转变为强制性的税收,而税收制度的设计正是以公平条件下推导出来的公正原则为基础的。

分配公正学说中其他的分配原则也都是从符合人们道德直觉的某个理论起点开始,进行符合逻辑的推导,总体上都遵循了程序正义的要求。例如:平均原则,从“人人平等”的道德原则出发推导出人们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绝对平均;福利平等和能力平等原则也是从“人人平等”出发,只是对平等分配的理解不同,推导出不同的分配原则;按需分配,从“满足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出发,推导出社会对必需品的分配原则;应得原则,从“给予有较优表现的人以优质的资源”出发,

^①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阐述了三种程序正义:完善的程序正义、不完善的程序正义,以及纯粹程序正义。其中,“完善的程序正义”指的是,对于结果是否正当有独立的判断标准,而且我们有可能设计出一个程序来达到这一标准。“不完善的程序正义”指的是,人们虽然有判断正确结果的独立标准,却不能保证达到它的程序。“纯粹程序正义”指的是,不存在判断结果是否正当的独立标准,只存在一种正确的或公平的程序。这种程序若被切实地执行,其结果也必然是正确的或公平的(不论其结果是什么),程序本身为其提供了正当性证明。参见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73-78。

推导出机会、荣誉、酬劳等社会益品的分配规则；沃尔泽的多元分配理论从“每一种分配原则有自己的‘场域’”出发推导出多元分配原则，等等。虽然这些理论推导没有像罗尔斯那样给出理论推导的“纯粹程序正义”，但也都遵循了相应的推理逻辑。

第二，诺奇克的资格理论充分地体现了程序正义发挥作用的第二个领域。

在诺奇克的公正学说中，三条正义原则构成了一个对所有社会益品进行分配的严格的纯粹程序正义。诺奇克将人们在社会合作中最终应当持有什么，视作一个纯粹程序正义的结果。诺奇克认为，通过公正的步骤从公正的状态中产生的任何东西自身都是公正的。基于这一理解，诺奇克将自己的公正学说称为“持有正义”（Justice of holdings），并将其阐述为三个原则：持有的获取原则，持有的转让原则，以及对违反前两个原则的矫正。对于“持有的获取”，诺奇克借鉴了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对“劳动获取理论”的经典论述，亦即一个人付出的劳动使其对无主物的持有具有资格。对于“持有的转让”原则，诺奇克基本上是将“自愿的交换”作为正义的转让原则，其中既包括市场上的自由交易，也包括朋友之间的礼物馈赠，以及遗赠、慈善，等等。至于第三条“持有的矫正”原则，诺奇克只是提出了对违反前两条原则的情况要进行“矫正”这一观点，但对于如何矫正以及应该从当前的不公正追溯到哪个时刻的不公正，诺奇克都没有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这一点可算是诺奇克持有正义理论中最薄弱之处。在诺奇克看来，持有正义的三条原则构成了社会分配的纯粹程序正义，只要这三条原则得到遵循、反复应用，人们手里的东西就是正当获取的，而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社会分配就是公正的。

罗尔斯的公正学说也试图将整个社会分配的过程设计成一个“纯粹程序正义”，这个程序就是“公平竞争”。在罗尔斯的构想中，如果第二条正义原则的第二部分——公平机会的平等原则能够得到一以贯之的执行，那么人们对资源的竞争就是公平的。人们应该无条件地接受公平竞争的结果，而无须对其进行修正，无论这一结果是有关物质利益的分配还是有关各种机会的获取。因为，在这样的竞争中，所有具有同等自然资质、同样志向的社会成员都有同等的教育和成功前景。罗尔斯指出：“公平机会原则的作用是要保证合作体系作为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①然而，罗尔斯注意到，在家庭制广泛存在的情况下，公平机会的平等原则是不可能得到完全执行的。因为，家庭教育的差别必然将不应得的不平等带入人们的竞争当中。例如，城市里大学老师的孩子与乡村的“留守儿童”，即使他们接受同等好的学校教育、有同等好的自然资质，由于家庭教育的巨大悬殊，乡村的留守儿童通常会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而且，公平机会的平等原则只能排除社会的偶然因素对社会分配的影响，并不能排除自然的偶然因素（例如天赋）对社会分配的影响。^②因此，罗尔斯在其正义理论中引入了对社会竞争结果进行最终调节的差别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因自然的偶然因素而导致的竞争结果的不平等要以保证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为限。

第三，程序正义发挥关键作用的第三个领域是在制度建构的过程中。

罗尔斯将从推导公正原则到最终形成政治制度的过程构想为四个阶段：在原初状态中选择公正原则、制宪会议、立法阶段、执法与守法。分配制度的构建涉及的主要是“制宪会议”和“立法阶段”。我们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在推导出分配公正的原则之后，为什么不是直接进入分配制度的“立法阶段”？“制宪会议”的作用何在？事实上，“制宪会议”的作用就在于确定分配制度立法

^①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76.

^② 在这里我们也能察觉到罗尔斯正义学说中不连贯的地方：他一方面认为公平机会的平等原则所主导的资源竞争是公平竞争，是社会分配的纯粹程序正义；但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人们在自然禀赋方面的差异是不应得的。但是，公平机会的平等原则并不能补偿那些在自然资质方面较差的社会成员。这也正是德沃金对罗尔斯的批评：公平机会的平等原则只关注了人们在社会境况方面的不平等，没有对自然禀赋的不平等进行校正。

的“程序正义”。也就是说,必须首先在广泛参与和平等商议的情况下订立出立法的恰当程序——宪法,才能进入具体的“立法阶段”。“制宪会议”的必要性体现的正是程序正义的重要性。在罗尔斯的构想中,制宪会议和立法阶段这两个步骤处理的是社会结构的不同部分。在制宪会议阶段,人们的主要任务是制定能够保证个人的基本自由、良心和思想自由的政治程序,以确定人们作为平等公民的地位。达到了这些目的的制宪会议就实现了政治正义。因此,制宪会议主要是对公正的第一条原则“平等的自由”的应用。在立法阶段,公正的第二条原则(尤其是差别原则)发挥了作用,“它表明社会、经济政策的目的是在机会均等和维持平等自由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提高最少获利者的长远预期”^①。同时,由于第一条公正原则优先于第二条公正原则,因此,制宪会议优先于立法阶段。这种优先不仅是在时间意义上的优先,而且意味着,所有的立法过程都必须受到宪法的限制。对于社会分配来说,所有分配制度的立法都必须具备程序正义的特征,都必须在广泛参与和民主监督的程序下进行。

四、研究分配公正,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综上所述,分配公正研究是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从原则到制度、从制度到政策,分配公正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规范所有社会益品的分配,实现分配公正。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大量的共同财富。如何更好地共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通过分配制度的设计真正提高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这正是目前的制度建设面对的重大问题。习近平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深入研究不同阶段的目标,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② 促进共同富裕,要把握好以下原则: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循序渐进。促进共同富裕,总的思路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建立公正的社会分配制度。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也是中西方政治制度应遵循的共同价值。^③ 共同富裕的实现依赖于公正的分配制度的构建。当代政治哲学中的分配公正研究从公正原则出发,规范分配制度的建构。分配公正的知识谱系正是构建公正的分配制度的学理基础。第一,要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的差别原则就深入讨论了这一问题。在罗尔斯看来,效率与公平并不总是矛盾的,如果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同时惠及社会中的低收入阶层,那么效率和公平就是一致的,就不需要为了公平而牺牲效率。相反,当经济增长并没有改善低收入者的生活前景,甚至加剧了他们的贫困,这时就必须优先满足公平而部分地牺牲效率。第二,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规范一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相关制度。在当代分配公正研究中,学者们对对应得原则的讨论有助于人们设计出更为公平的薪酬制度,这将有助于维

①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75.

②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载《求是》,2021(20)。

③ “公正”一词对应的英文是 justice,在西方语境中被看作是社会制度应遵循的价值。在中国学界,justice 也被翻译为“正义”。

护一次分配的公平。除此而外，市场原则也在薪酬制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市场原则的过度应用可能会导致一次分配的不公，甚至使得某些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因此，在当代分配公正研究中，学者们对“最低工资”“最长工作时间”等限制市场的制度设计进行了论证。这些研究也有助于建构更为公平的一次分配制度。对于以税收制度为核心的二次分配，左派自由至上主义以及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理论都对房产税、遗产税、个人所得税等进行了深入的论证。对于以慈善为主的三次分配制度，诺奇克等学者对其也有深入讨论。第三，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建立医疗、教育、社保等公共资源的分配规则，而当代学者对按需分配原则的深入讨论为这些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提供了借鉴。支持“按需分配”的充足主义者认为，对于维持人们基本生活的物质资源，应该依据人们的需要进行分配。这一原则可作为分配医疗资源、教育资源、社保资源的指导性原则。将公共资源分配给真正需要它们的人，以保障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因此，在批评的基础上借鉴当代分配公正研究的丰硕成果，有助于在制度设计中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有助于设计出兼顾一次、二次和三次分配的公正的分配制度，也有助于建构公众认可的分配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资源的分配规则。

总之，厘清分配公正的原则，在批评西方分配学说的基础上为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建构出谋划策，这正是中国学者理应做出的智识贡献。中国学者应在批评西方分配公正学说的基础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文化传统的分配公正理论，进一步规范各项社会分配制度，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坚实的学理基础。

On the Genealogy of Knowledge Regarding the Study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LI Sh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starts from the study on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that regula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stributive institutions. The important distributive principles put forward by contemporary scholars include the principles of equality, efficiency, differentiation, entitlement, equal resource, equal capacity, equal welfare,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one's need,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one's share, and multiple dimensions of distribution. These ten principles have profoundly shaped such important social distributive institutions as systems of ownership, tax, salary, and social security. Procedural justice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istributive institutions.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o construct a just distributive system serves as the basis for the pursuit of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Distributive justice; Just principles; Distributive institutions; Procedural justice

(责任编辑 林 间)